

阿拉伯世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 郭宪纲

〔关键词〕阿拉伯世界、第三条道路、军事强人、西方式民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土耳其模式

〔提 要〕当前阿拉伯世界动荡所反映出来的态势是：世俗力量的救国和改造社会的道路难以为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渐趋式微。阿拉伯世界面临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或是选择移植西方式民主政体；或是寻找一条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发展道路，建立既适应现代社会和国际潮流，又尊重本地区历史和文化传统，包容宗教和世俗民主的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D73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11) 5期 0077-09

〔完稿日期〕2011年8月20日

〔作者简介〕郭宪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自2010年底伊始，阿拉伯世界陷入了抗议示威、流血冲突和政权更替的剧烈动荡中。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权更替，也门、叙利亚政局险象环生，巴林王室不得不求助外部力量弹压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国内反对派，以维持统治。席卷中东地区的这场动荡所反映出来的态势是阿拉伯世界军事强人政权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君主政体亦面临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世俗救国思潮和改造社会的实践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与此同时，作为中东地区另一支重要力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这场动荡中或冲锋陷阵，或居于幕后推波助澜，或静观其变，待机而动。不过，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合乎当代潮流，其某些组织从事恐怖活动，形象不佳，难以乘势而为。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阿拉伯世界何去何从，是移植西方民主政体还是另辟蹊径，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历史抉择。

一、世俗力量救国之路的探索与重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中,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两种颇具影响的救国思潮:一种是世俗的救国思潮,主要为泛阿拉伯主义;另一种是宗教的救国思潮,主要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正式出现于1931年召开的全阿拉伯代表会议,主张具有共同语言、宗教、历史和地理联系的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推翻封建王朝,赶走外国入侵者,建立富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其著名的实践者是埃及的纳赛尔。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腐朽的法鲁克王朝,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1956年,纳赛尔宣布收回被西方列强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挫败了英国和法国联军的干预。1958年2月,埃及同叙利亚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9月,由于埃及和叙利亚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矛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解体。尽管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只存在了3年多,但却是阿拉伯民族在现代史上进行联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利比亚的卡扎菲也信奉泛阿拉伯主义,崇拜纳赛尔,于1969年9月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依赖西方国家的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同时,卡扎菲政府要求利比亚与埃及合并,但由于1973年卡扎菲批评纳赛尔的继承人萨达特“对于巴勒斯坦的事业只限于口头上的支持”,埋怨萨达特与以色列“走外交谈判的道路”,^[1] 双方积怨甚深,合并构想未能实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亦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者,其领导人,如叙利亚的阿萨德十分钦佩纳赛尔,主张复兴阿拉伯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反帝、反殖、反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此外,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也纷纷在世俗力量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赢得了民族独立。纳赛尔等一批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共和国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一度如日中天,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尽管世俗力量的救国思潮和实践取得了成绩,洗刷了殖民统治带来的耻辱,增强了阿拉伯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实行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普及教育,为阿拉伯世界从游牧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演进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各

[1] 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商务印书馆,第530页。

国利益不同,阿拉伯统一的理想未能实现。更令人遗憾的是,军事强人在推翻了封建王朝后建立的政权逐渐演变为家族统治,余下的阿拉伯国家多实行君主制,共和政体寥寥无几。这些军事强人政权和君主制政权未能妥善解决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内满足不了人民的生活需求和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对外败在以色列手下,收复不了失地和圣城。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空军的战机在24小时内被以色列摧毁,丧失制空权的阿拉伯军队一败涂地。在持续了6天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此次战争前以色列领土的4倍。^[2] 纳赛尔深受打击,在埃及接受停火的翌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后在人民的强烈挽留下同意留任。

1970年,深受人民爱戴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纳赛尔去世,阿拉伯世界失去了众望所归的领袖,团结精神减弱。1978年9月,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1979年签署了《埃以和约》,收回了西奈半岛。埃及单独与以色列媾和遭到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强烈谴责。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将其总部迁离开罗,停止埃及的联盟成员资格,要求其他成员国中断与埃及的关系。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响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决定,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直到10年后的1989年5月,埃及才恢复阿盟的成员资格。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对阿拉伯人民收复被占领土的事业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至今约旦河西岸大部、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仍未收复,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民依然流落他乡。同时,阿拉伯世界的民生问题日益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终于被来自突尼斯的小小火星点燃,蔓延成震惊世界的熊熊烈火。虽然阿拉伯地区军事强人政权由强趋弱、走向瓦解的情况各异,但究其基本原因,却多有相同之处:

1. 体制僵化,腐败严重。多数领导人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后,将军队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石,大权在握,缺乏制约,选举形同虚设;家族利益至上,子承父业,裙带关系盛行,大搞家天下,逐渐脱离群众;贪污受贿,对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漠不关心,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也面临类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2. 对外未能收复圣城和失地。虽然埃及通过谈判收复了西奈半岛,但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等仍处在被占领状态,巴勒斯坦人民依然无家可归,而且以色列还不断修建定居点,企图永久霸占阿拉伯领土,

[2] 解力夫:《中东战争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33页。

导致阿以和谈破裂。阿拉伯人民雪耻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对本国统治者捍卫领土和主权的能力失去信心。

3. 与美国结盟。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大支持者,在多次中东战争中为以色列输血,致使阿拉伯国家战败。但是,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不仅没有与美国划清界线,反而站在美国一边,接受大量美援。对美国不满的阿拉伯人民,对本国执政者不与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国划清界限,反而与其沆瀣一气的做法持鄙视态度。

4. 一盘散沙。阿拉伯20多个国家各打自身算盘,很难合为一体,除埃及和叙利亚短暂统一外,多数阿拉伯国家根本无意统一,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被束之高阁。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也缺乏协调和有效合作,被以色列各个击破。战败的执政者在阿拉伯人民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2011年8月3日,埃及公开审判穆巴拉克。8月11日,埃及内阁宣布准备启动程序解除实行长达30年的紧急状态法。叙利亚也取消了实行48年的紧急状态法,开放党禁,允许其他政党合法活动。随着埃及前领导人的受审,在中东独领风骚几十年的阿拉伯军事强人政权开始走上末路,要么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让路,要么顽抗到底被人民抛弃,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已不大可能。

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走向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式出现于1928年,其标志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穆斯林兄弟会主张从伊斯兰教义中寻求精神食粮,回归传统,重建《古兰经》的权威,以此来根除世俗世界的腐败,实现社会公正,并驱逐外国侵略者。在20世纪30年代埃及人民反对本国封建王朝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英埃协定》的浪潮中,穆斯林兄弟会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圣战主张,宣布要将埃及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府。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穆斯林兄弟会号召人民进行圣战收复圣城和失地,其成员与埃及军队并肩作战,表现英勇,在军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1952年7月,穆斯林兄弟会配合纳赛尔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但由于治国理念不同,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在埃及建立共和制后分道扬镳,其领导人被世俗政权投入监狱。此后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受压状态,不得参加选举,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转而频繁发动针对政府的袭击。1981年,混入埃及军队的穆斯林兄弟会极端分子刺杀了正在阅兵的萨达特总统。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埃及政府虽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和解姿态,但不允许其完全合

法化。埃及军事强人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的矛盾，迫使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投放到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上。

除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该地区陆续出现了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如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索马里的青年党、突尼斯的纳哈达、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科威特的社会改革学会、巴林的解放巴林伊斯兰阵线、苏丹的全国伊斯兰阵线等。还有1988年成立的基地组织。除基地组织外，这些组织在早期反抗西方侵略和本国封建王朝的斗争中大多曾与世俗力量合作，并肩战斗，后期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际遇相同，遭到不同程度的镇压。阿拉伯世界的教俗之争大大削弱了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力量。

20世纪中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开始使用残忍手段，从事恐怖活动。特别是基地组织，策划实施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世纪后期开始，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通过参加选举来表达政治诉求并在大选中获胜，但被世俗政权和军方否定，最突出的例子是阿尔及利亚。1991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立法议会选举，伊斯兰拯救阵线大获全胜。阿尔及利亚军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取消大选结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逮捕该组织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转入地下，开展恐怖活动与军方周旋。也有一些原教旨主义组织在大选中获胜并在特定的地区掌权，但未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2005年1月，哈马斯在加沙地方议会大选中获胜，一年后在巴勒斯坦议会大选中获胜。至今，哈马斯仍控制加沙地区，但被西方和以色列视为非法和恐怖组织。

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遍布阿拉伯世界并向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扩展，是伊斯兰世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史看，亚洲古代和中世纪、欧洲中世纪，都出现过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摒弃了这种过时的落后政体。显然，当今中东地区宗教势力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理论和实践，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这种历史回潮和悖论有其特殊的原因：

1. 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根深蒂固，清真寺遍布各个角落，有资金甚至地产和产业，经济实力雄厚，关键时刻解囊相助急需帮助的百姓。获得资助的人民感恩戴德，往往在选举时投票支持伊斯兰宗教组织或政党或加入其队伍。

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相对廉洁，战斗力强，对人民有号召力。原教旨主义力量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基本未被权力和金钱腐蚀。在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表现英勇，如黎巴嫩真主党以区区兵力，在反击

强敌以色列入侵战斗中顽强奋战，迫使以军退出黎巴嫩。这与腐化堕落的世俗军事强人政权和无能的君主政权形成鲜明对比。

3. 美国偏袒以色列，支持中东伊斯兰世界中的温和世俗政权，给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号召人民的绝佳理由。美国中东政策受到国内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操控，在阿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否决联合国谴责以色列的议案，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弹药，而且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美援。阿拉伯民众认为，阿拉伯国家至今未能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国土，除了本国执政者无能外，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就此指责阿拉伯世俗政权与阿拉伯世界的敌人美国狼狈为奸，号召人民集合在伊斯兰的旗帜下解放圣城和失地。

但是，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欢迎，在选举中可获得胜利，但由于与当代国际潮流背道而驰，其极端组织采取恐怖手段，滥杀无辜，尤其是“9·11”袭击事件，显示了基地组织极端残忍、毫无人性的本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激起包括阿拉伯百姓和伊斯兰信徒在内的人们的反对。在全球反恐斗争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开始走下坡路。穆斯林信徒与其拉开距离，包括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组织开始思考新的斗争方式。在当前埃及的动荡中，穆斯林兄弟会并未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表达政治诉求，而是保持低调，参与反对派同军方的谈判。作为最早成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变化表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认识到，拒绝放弃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在黎巴嫩，真主党也开始从单纯从事武装斗争转向政治军事相结合的方式。在巴勒斯坦，自2007年以来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也改变强硬态度，与世俗抵抗力量法塔赫达成和解。2011年5月4日，哈马斯与法塔赫签署了内部和解协议，同意一年后举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议会选举，并成立“最高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安全事务。8月初，双方签署了互相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的协议，并将继续举行协商，推进社会和解。哈马斯与法塔赫冰释前嫌，团结自强，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有利于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三、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阿拉伯世界世俗救国道路严重受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难有作为，阿拉伯世界由此面临着第三条道路的两难选择：一种是移植西方式民主政体；另一种是寻找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建立既适应现代社会和国际潮流，又尊重本

地区历史和传统，包容宗教和世俗民主的政治体制。

第一种选择，即移植西方式民主政体。在西方看来，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动荡是“阿拉伯之春”，能为阿拉伯世界带来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早在2004年，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就进行了此类尝试，制订了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的“大中东计划”，以改造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但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大中东计划”超越了阿拉伯世界社会的发展阶段。民主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欧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市民和中产阶级壮大的基础上，在文化、思想、宗教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基本上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阿拉伯世界情况则大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文化发展滞后，宗教影响深远，内外矛盾交织，不具备进行西方式民主变革的基本条件。7年过后，阿拉伯世界的这种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具体而言：

第一，从经济基础上看，阿拉伯国家不论产油国或非产油国，市场经济均较为弱小。产油国经济结构单一，富人阶层依赖石油收入，缺乏市场竞争意识，政治权利意识也较为薄弱，与近代欧洲中产阶级截然不同，难以成为变革的中坚力量。非产油国更是经济落后，缺乏市场活力。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阿拉伯人口数量翻番，但其投资在世界上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贸易额下降了三分之二，一半阿拉伯国家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经济落后导致中产阶级力量成长缓慢，政治现代化进程举步艰难。

第二，阿以冲突得不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临战状态，政治现代化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收复家园，进行圣战的伊斯兰组织，更具有号召力。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只有在拥有政治尊严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只要巴勒斯坦人民仍然生活在以色列控制之下，每日忍辱负重地生活，他们就不会被民主吸引。”^[4]

第三，美国在推广“民主”时实行双重标准，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不佳。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自身利益为标杆，只要是亲美政权，不论是否民主，都加以支持，否则坚决打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军方镇压在民主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再譬如，按照民主的原则，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应在伊拉克举行直接选举，由于担心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通过直接选举掌权，美国力主召开伊拉克各省的基层会议，选举新的过渡

[3] Joseph Liberman, "The Theological Iron Curta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3.

[4] 布热津斯基：“向阿拉伯国家推销民主的错误方法”，《纽约时报》，2004年3月8日。

性立法机构,作为过渡政府接管主权。这引起占伊拉克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反对美国通过间接选举方式建立伊拉克新政府的方案,坚持要求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合法的政府。

第四,伊斯兰激进势力在选举中获胜几率大。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符合时代潮流,人民对其极端组织的恐怖行径反感,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相对清廉,敢于抵抗美国的渗透和以色列的侵略,因而深受穆斯林百姓敬佩。在世俗力量腐败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人民倾向将选票投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或政党,20世纪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大选的一幕极有可能重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对此颇有远见,他曾提醒世人要注意在中东地区政治真空中推动民主的危险性,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产生混乱。因此,必须在改革的必要性和造成更多混乱的危险之间谨慎穿行。^[5]

以上分析表明,阿拉伯世界目前不具备移植西方式民主政体的条件,那么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又在何方?无论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还是现状来看,只有能够解决本地区重大问题的模式才是正确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首先,该模式能够团结本地区主要的世俗和宗教力量。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经过几十年的博弈,消耗了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力量,不利于阿拉伯的团结和解放事业。对此,以色列心知肚明,十分担心阿拉伯世界拧成一股绳,无怪乎2011年5月4日哈马斯与法塔赫达成和解后以色列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反对。因此,停止阿拉伯国家的内耗,增强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家园,这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要任务。

其次,该模式必须是现代与传统的相结合而非对立。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相互影响和依存加深,阿拉伯国家不可能置身世界潮流之外,而政教分离无疑是当今世界潮流之一。要顺应当代国际社会的潮流,阿拉伯国家必须与时俱进,实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政教分离体制。与此同时,宗教在阿拉伯世界影响深远,因而一方面要实行政教分离,另一方面也要尊重伊斯兰教的传统,允许宗教组织或政党在遵守政教分离原则的前提下参加选举,并在获胜后执政。世俗和宗教相互包容,实现教俗妥协,为阿拉伯世界稳定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三,该模式能够从机制上防止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家族手中。新的政治体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倾听民声,铲除腐败,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公正。

[5] 基辛格:“干涉要有构想”,《华盛顿邮报》,2004年4月11日。

第四，该模式能够根除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仅解决不了巴以冲突，而且损害了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教的形象，给了外部势力干涉本地区内部事务的借口。为此，世俗力量应区别对待一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极端组织，团结温和的伊斯兰组织和政党，孤立和打击恐怖势力。

第五，该模式可参照土耳其现行体制。土耳其虽不是阿拉伯国家，却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与阿拉伯国家有许多相似性。20世纪20年代初，土耳其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打败了西方入侵者，建立了共和国并实行政教分离的宪法。近年来，具有亲伊斯兰性质的正义与发展党力量上升，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大选中频频获胜。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繁荣党。繁荣党曾在1996年至1997年执政期间推进国家的伊斯兰化，导致与军方关系紧张。1997年，军队以繁荣党政府威胁到政教分离原则为由，强力干政，迫使繁荣党政府下台。繁荣党失去政权后进行反思和重新组合，温和派从激进派中分离出来，推行理性的政策。2003年，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获胜后掌权，不再推行带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政策，而是与世俗力量合作；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修订宪法，巧妙地限制军方干政。自2010年2月以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以涉嫌密谋推翻政府为由，逮捕和调查多名土耳其高级军官，用法律维护民选政府的权力。2011年7月29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和海陆空三军统帅集体辞职，以抗议政府调查高级将领。土耳其政府立即任命新的总参谋长。与以往军方通过政变和威胁干政迫使政府下台相比，此次土耳其文官政府在与军方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表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了既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又尊重民选政府，教俗双方在现代宪法框架下共处的政治格局，保证国家稳定与发展。对外方面，挣脱了军方束缚的土耳其政府拉开了与西方的距离，加大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力度，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大幅提高。这种利国利民的土耳其模式，对阿拉伯国家来讲不失为重要的选择参照。

结 语

当前，阿拉伯世界仍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各种力量正在激烈博弈，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任重而道远。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历经苦难和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阿拉伯人民在实践中会找到适合自身文化、历史和传统的发展道路，并不断对其加以完善。